

非常责任

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

殷雄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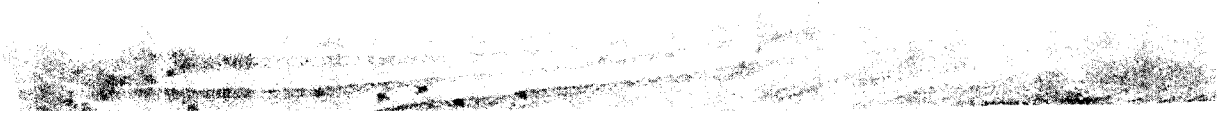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非常责任

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

殷 雄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殷雄 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5

ISBN 7-5011-7489-X

I. 非… II. 殷…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5425 号

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

责任编辑：贾允河

装帧设计：晓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100043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济宁市火炬书刊印务中心

开 本：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16.125

字 数：255 千字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山东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1-7489-X

定 价：29.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殷雄，1965年生。理学硕士，法国国际工商管理博士（在读），高级工程师。原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发展计划部经理。2004年2月至2006年1月，受中共中央组织部派遣，赴贵州省毕节市挂职锻炼，担任中共毕节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先后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中国新星石油公司、海南省三亚市委、三亚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实验核物理》（译著），原子能出版社
1996年12月版；

《世纪回眸：世界原子弹风云录》，新华出版社
1999年1月版；

《谁在威胁中国安全》，新华出版社
1999年7月版；

《诸葛亮〈心书〉探微》（上、下册），长春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剑与血：北约东扩的背后》，新华出版社
2000年1月版；

《武装未来》（译著），新华出版社
2000年1月版；

《新干涉主义》（译著），新华出版社
2000年5月版；

《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译著），新华出版社
2001年1月版；

《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译著），新华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微粒爆惊雷：核能科技》，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责任编辑 贾允河

封面设计 晓 明

毕节：和谐社会的试验区

——代序言

作为现任中央智力支边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我曾多次到毕节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应该说对毕节是比较熟悉的。但面前的这部书稿仍然引起了我很大兴趣，原因有二：其一，这部书稿讲的是毕节的事情，容易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其二，这部书稿的作者是一位年轻干部，根据中央组织的安排，在毕节市挂职两年，对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比较客观、深入的思考，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贵州自古地瘠民穷，地处黔西北的毕节犹甚。70年前，当红军长征走进毕节这片乌蒙山区腹地时，这里就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人烟稀少、地瘠民穷的地带。半个世纪之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再次走进这块土地时，这里已经被联合国确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无限制的平原垦殖使石漠化程度不断加大，耕地破碎，植被稀少，陷入越生越多、越多越穷、越穷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毕节地区辖八个县（市），其中有6个是国家级贫困县。严重的生态恶化和水土流失，不仅使当地人民群众面临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巨大危险，而且每年数以万吨计的泥沙排入长江、珠江，对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为了尽快改变毕节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1988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毕节考察时提出，要把毕节办成一个生态试验区，确定生态建设、扶贫开发、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努力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88年4月，受胡锦涛同志的邀请，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前往毕节，进行了为期13天的实地调研，并随后组建了由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参加、以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为组长的支援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当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贵州省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毕节的发展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建立毕节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开发西部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举措，开创了在我国西部地区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先河，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落实的具体体现。毕节试验区在“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方面所取得的经验表明，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而且促进了贫困地区生态、人口、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作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坚持在实践中锻炼干部，是我们党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一条历史经验。殷雄同志的这本著作，就是他在毕节市两年挂职期间深入调查研究、独立思考的结晶。本书所思考的问题来自工作实践，而且行文充满辩证思维的色彩，避免极端倾向。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作者在本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观点与看法并不一定正确，但作为一名年轻干部，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用心思考问题，是值得肯定的。作者虽然出身于理工科，但具有较丰富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说明他是一个勤于学习、勤于思考的人。衷心祝愿他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勤奋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毕节试验区自成立以来，经过 18 年的发展，虽然仍是全国贫困地区之一，但是，从纵向比较看，在全国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毕节试验区在实践过程中和前进道路上仍然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作为试验区，毕节以前是在探索，以后还将继续探索，但它的存在与健康发展，无可争议地表明，即使是在中国最穷、生态和人口压力最大的落后地区，也完全有可能进入小康社会。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的经验，对我国实现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毕节试验区的发展道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1994 年，我到贵州山区考察时，曾赋七绝一首：“隔宿无粮实可哀，空余景色逐人来。但求遍野花齐放，不信青山不聚财。”隔了 12 年，贵州山区的情况变了，毕节地区的情况变了。我相信，只要沿着既定的道路持之以恒地走下去，毕节地区必定会开创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厉以宁

2006 年 2 月 24 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毕节：和谐社会的试验区（代序言）	厉以宁 1
------------------------	-------

思辨篇

做事与做官	3
权力与真理	10
群众与干部	15
是非与对错	18
务虚与务实	23
态度与能力	27
自满与自卑	31
净畅与宁和	34
总量与平均	37
手段与目的	41
新观念与旧习惯	44
难作为与不作为	48
勤政·廉政·善政	53
盛世·乱世·驰世	61
七星关断想	68

战略篇

论机遇	75
论绿色城镇化	85
论城市定位	108
论招商引资新思维	119

论“破窗理论”对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瓶颈的意义	135
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十大关系	143
论毕节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	161
论毕节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选择	172

调研篇

开启高科技项目的先河	183
幸福村调查记	192
毕节市招商引资环境现状的调研报告	200
发展绿色经济的思考	212

附 录

论诸葛亮法治思想的缺失	219
论岳飞悲剧的性格因素	233

后 记	249
-----------	-----

思 辨 篇

做事与做官

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这个话是中山先生于1923年12月在岭南大学演讲时说的，其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学生们正确处理做事与做官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中山先生做的“官”可是够大的了，可以说是“党政军”一把手：中国国民党总裁，是“党”的首脑；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更是国家元首的级别；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空军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长官。试想，这几个“官”还不够大吗？可见，中山先生是不反对“做大官”的。

想做官丢人吗？不丢人。做了官，手中有了权，可以做好多事情。“学而优则仕”，“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是中国古代无数读书人的政治理想，在他们看来，做官是正经“职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有多少人寒窗苦读去考进士。“进士”为何物？做官的敲门砖。由于“名额”的限制，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是考不上进士因而也做不上官的。

那么，有没有真不想做官的人呢？有，而且为数不少，但原因各异。笔者归纳了一下，大体上可分为六类人：

第一类人是由于与当政者政见不合，为保自己的名节而辞官不做。“伯威耦耕，不慕诸侯之乐”，说的是尧帝时的大臣伯成子高，觉得尧帝的治国方略比较高明，“不赏而民勤，不罚而民畏”。大禹继位后，他不认同其施政纲领，认为大禹当政以来“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走的不是正道，于是辞职不干，回家种地去了。这类人属于“理想主义者”，与其做官受罪，不如回家自在。

第二类人是由于当时的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不愿意同流合污，于是隐居山林，与世无争。这类人历朝历代都有，典型的有东晋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自认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因此辞官回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去了。武将中有南宋时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冤狱，举朝无人敢出一语，独韩世忠痛斥秦桧，留下“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的传世名句。秦桧收其兵权，此后更被罢黜实际权利。他看着秦桧把持

的朝政实在不顺眼，干脆要求“复员”，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游西湖以自娱”，倒也落得个逍遥自在，安度晚年。

第三类人是自视清高，从骨子里看不起当政者，于是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最典型的例子要数东汉初年浙江余姚人严光（字子陵），曾与汉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建东汉即帝位后，他改名隐居。严光不仕光武，被历代推崇为“富贵不能淫”的高风亮节。北宋名臣范仲淹对他赞赏备至，在到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县）做知府的上任途中路过严光在富春江钓鱼的地方时写了一首诗：“君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他在《严先生祠堂记》的结尾曾歌颂严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毛泽东于1913年在《讲堂录》中对严光也是赞誉有加，“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其实，在我看来，严光并非真的不想做官，而是看透了刘秀，不愿屈尊伺候。司徒侯霸去请严光到京城做官，严光不领情，给刘秀写了一封信，要他“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这实际上是告诉刘秀如何“抓纲治国”。刘秀看完信后，说了一句“狂奴故态也”。这五个字不经意间暴露了刘秀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的真实内心世界。这哪里是什么“尊重人才”，分明是想拿严光来“做秀”，以示自己礼贤下士。庆幸严光，他的选择是对的，否则，今后少不了遭到“卸磨杀驴”的厄运，也就不会有垂钓富春江的千古佳话了。解放初期，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给毛泽东写诗发牢骚，表示自己要效仿严光去隐居了，“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毛泽东和诗安慰，“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他们两位在诗中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第四类人是一些学者，志不在做官。据《南村辍耕录》载，元朝学者许谦隐居金华山著书立言，“四十年不入城府”。搜寻“遗贤”的人们访到了他的名声，“以学行荐于朝”，想请他出山来做官，也确实办成了。然而“有录其举文至者，先生方讲说，目不少一视”，对政府给他的“任命文件”看都不看一眼。据《元史》记载，许谦天资极高，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陶氏“口授《孝经》、《论语》，入耳辄不忘”。长大后，到了“于书无不读”的地步。可见，这是一个典型的学者。他不愿意做官，但在读书方面却真是有一套，“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可见他

并不是死读书，而是有自己的见地。后来，他“开门延徒”做了教书先生，也很讲究教学方法，“情者作之，锐者抑之，拘者开之，放者约之”，使“著录者千余人，随其才分，咸有所得”，至于“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然而许谦的原则，是“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乡闾大比，请他去评卷他都不干。许谦认为读书、科举，“此义、利之所由分也”，读书如果为了科举，性质就变了。这位许谦与“学而优则仕”的普通读书人确实大不一样。

第五类人是做官做得好好的，突然不知什么原因就不想做了。据《榆巢杂识》载，清朝周邵生做刑部主事，这个官当得好好的，忽然有一天“淡于仕进”，于是“未华颠即抽簪去”，回去的时候，行囊是满满的一船书。华颠，即白头，指的是年老；抽簪，谓弃官隐退。《后汉书》有“唐且华颠以悟秦，甘罗童牙而报赵”的典故，说的是90岁的唐且与12岁的甘罗同样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用今天的话说，周邵生还没到年龄就提前退休了。他是自己突然“悟道”了，还是在官场上受了什么刺激，看破了“红尘”，我们今天不得而知，史书上也没有说清楚，总之是自己中途打退堂鼓了。此公自己不做官尚且罢了，他回家后当了教书先生，还告诫自己的学生：“书可读，官不必做。”

第六类人比较特殊，在当政者的暗示之下，为了不对其构成威胁，颇有“自知之明”地主动引退，这类人属于“被动辞官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把戏中知趣地请辞的石守信等人。

上述六类人只是一个大体上的分类，有些不做官的原因可能诸因兼有，并非单一的原因。

我们回过头来说中山先生所说的“做大事”。什么算是“大事”？中山先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事实上也不可能有标准，主要看具体的情境。“治国、平天下”算是大事吧，可是对于一个无官无职的平头老百姓来说，他有什么条件做此等“大事”？尽管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大声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这也只能是从精神境界的层面上来“正确理解”了，况且他在前面还有一句“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还是把国家大事推到当政者的身上了。在很多情况下，手无寸柄的普通人对此等“大事”只能是“坐观钓鱼者，徒有羡鱼情”，有这个心，没这个力。与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大事”还是“小事”？从“民以食为天”的角度来

说，这恐怕是天下最大的事情了。我猜想，中山先生所谓“大事”的本意，大概指此吧。他的“天下为公”的理念，也是体现了这个意思的。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要解决自己的这类需求，不做官也是可以的；但若想解决一村、一乡、一县、一地、一省乃至一国的全体人民的这类需求，恐怕不做官是不行的，不是“肉食者”就不会去谋划这些事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必定包含了要有一定的官职的意思。

如此说来，做事与做官之间还真是有一定的必然联系，特别是“做大事”与“做大官”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私事除外，要想办一些公事，还真要有一定的位子，“有为才能有位”固然不错，但“有位才能有为”可能更符合逻辑。所不同的是这个“为”字大有讲究，要做好事而不要做坏事，要做好官而不要做坏官，“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就是这个意思。《尚书》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也是说要选择“好官”为天下人做好事，选拔官吏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爵以赏功，职以任能”。因此，即使有想“做官”的思想也并不可虑，可虑的是“做官”之后的作为。吉鸿昌的父亲说“做官即不须发财”，算是一个对“做官”的要求。对于那些坏官，“做大事”与“做大官”之间尽管没有必然的和绝对的因果关系，但相互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依存度，这是确定无疑的，只不过是两者之间的境界不同罢了。

普通老百姓都希望做官的人是好人，但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鱼目混珠、良莠不齐是官场的普遍现象。在特定的土壤和条件下，好官也可能变成坏官，后者的表现形式就更是不胜枚举了。人们一提坏官，往往与那些在金钱和声色方面的腐败分子相联系，实际上表现形式多多。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学界的三魂》中就为我们画了一类坏官的像：“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这只是一类坏官而已。在他们看来，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乃做官的本事，更是做大官的功夫。他们做事、做官，有种特异癖好，即为“做秀”。在某种意义上说，好做秀、善做秀，正是一些人通往做官、做大官之途的一块敲门砖，一条终南捷径。小官要升上大官，副职要变为正职，乡镇的要调到城里来，“差”单位的要挤进“好”单位里来，等等，这一切都需要“下功夫”，于是，各种“政绩秀”、“文凭秀”、“形象秀”、“模仿秀”甚至“跑官、要官、买官”

等等把戏就一齐来了，目的只有一个：博取上司的注意和赏识，以达到自己做官、升官的目的。

世人一说到“官”，马上联想到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民间有一种“当官要当副”的说法，意思是既满足了当官的愿望，又不用负太大的责任。其实，不管正职还是副职，都是有一定权力的，只是大小不同而已。做官而无权，就失去了做事的基本条件。因此，“权”是“官”的根本属性。诸葛亮对于“权”的重要性有着透彻的理解，他在《将苑》中的第一篇就是讲“兵权”，论述了兵权对将领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将领一旦失去这种兵权的极端危害性：“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机，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若将失兵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诸葛亮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一是“执兵机”，就是说将领一定要掌握兵权；二是“操兵势”，就是说将领不仅要掌握兵权，而且还要树立起作为主将的威严，做到令行禁止。能够将“权”与“威”有机地结合，这是合格将领应该具备的重要素质。曹操在铜雀台上大宴群臣时，也说了他要继续掌权的理由。曹操在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后，说自己“本志有限”，并不愿多带兵。后来讨平二袁，占据荆州，天下初定，“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感到心满意足了。话虽如此，但他更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重要性。如果国家没有他来掌权，“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氏三代身负重任，都是为了国家。现在手中的兵权还不能放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如果自己一旦交出兵权，不仅子孙后代将遭祸端，国家也将倾危，因此，自己不能做那种“慕虚名而处实祸”的事情。现在“江湖未静”，自己“不可让位”，不得不继续执掌兵权。

在考察“做事”与“做官”之间的关系时，还会引出一个更为重要的命题：政治家与政客之间的区别。政治家与政客是政坛的南北两极，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但是，在很多时候，要准确地将这两种角色区分开来，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两者之间有一些模糊的“交集”。比如，政治家为了取得权力，有时也会像政客一样不择手段，这时的政治家和政客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区别；再比如，政治家和政客都对他人、对社会、对历史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有积极和消极两面。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政治

家为了大的目标有时也会牺牲一些小的原则，被迫干出几样迎合时世的丑行，给反对他的政客留下了把柄。尤其是那些成功的政客和失败的政治家，更容易蒙蔽人们的视线，把政客误认为政治家。因此，要区分这两种角色，就如同区分君子与小人那样难。

话又说回来，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的属性，只要认真分析不同事物的属性，就会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比如，《论语》中就将君子与小人进行了区分：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也许《论语》或其他典籍中还有关于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但从这两种角色的本质属性来说，大体上也就是这些了。循着这种思路，我们也可以粗线条地对政治家与政客进行区分：政治家有明确而远大的政治理想，政客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家有明确的是非标准，政客没有是非标准；政治家心胸开阔，光明磊落，政客心理阴暗，善搞两面派；政治家情操高尚，政客品德低劣；政治家以琢磨事为主，政客以琢磨人为主；政治家主要是做事，政客主要是做官；政治家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和大局意识，政客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政治家为公行使权力，政客为私行使权力。概括一句话，政治家是君子，政客是小人。

以上这些区分，只是理论上或概念上是如此，实际上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区分远没有这样清晰，因此，人们要准确地区分他们的惟一可靠的办法，就是通过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长期的、全面的、不间断的和辩证的分析与判断，在时间上采取“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的态度，在行为上采取“达而视其所举，富而视其所交，贫而视其所不予”的态度，在判断标准上采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态度。

张学良生前在参观郑成功纪念馆后题了一首诗：“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首七绝，把郑成功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形象描述得十分形象生动。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郑成功几乎具备了前文所述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所有条件。值得指出的是，官职大小不是区分两者的标准，政治家不一定是高官显爵，政客也不一定是芝麻小官。袁世凯贵为国家元首，但他却是一个十足的政客，是